

# 公元 3-6 世纪 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邹绍荣<sup>1</sup> 李小树<sup>2</sup>

(1.中国物资出版社, 100834; 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 3-6 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 5 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 3-6 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关键词:**公元 3-6 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0)01-0021-06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曾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sup>[1]</sup>公元 3-6 世纪,中国史学的这种“发达”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而在自然环境严重制约着人类活动的古代,体现这种“发达”特征的是分布于不同空间范围的各具特色的史学形态,这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史学版图”。以“区域”为空间界限对组成这一版图的不同形态的史学进行考察,对准确把握史学的发展演化,应当不无意义。而三晋作为“异质文化”交汇区的代表,其公元 3-6 世纪的史学有着值得我们关注的特质。

## 一、三晋地区的文化与史学传统

“三晋”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对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诸侯国辖地的合称。尽管这三个诸侯国并无政治上的统属关系,但由于其地域“共性”十分突出,加之韩、赵、魏这三国是由战国前的晋国“分政”而成,因而自西汉起,“三晋”作为合称成为一个“习惯性称谓”而被长期沿用。相反,韩、赵、魏三地的分称则相对少见,其所反映的是三晋在文化上的“地域认同”。由此,自两汉起,“三晋”作为一个区域名称便常常见于史著,而其地理范围则为战国前晋国统辖

之地,大体以今天的山西省为主,含河南、河北两省的部分地区。

三晋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三晋地区号称“表里山河”,夏、商、周三代以来,晋阳更有“中原北门”之称,具有沟通秦陇和关东地区的重要作用。西晋名臣刘琨更认为,三晋之地,“实迩皇畿,南通河内,东连司冀,北捍殊俗,西御强虜。”<sup>[2]</sup><sup>1680-1681</sup>同时,三晋地区是各民族文化即“异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区域,所谓“北捍殊俗,西御强虜”,正是三晋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交流极为频繁的真实写照。

早在公元 3 世纪之前,三晋地区便是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秦汉时期,以晋阳为中心的三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称之为“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sup>[3]</sup><sup>968</sup>。处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的特定地缘因素,使三晋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文化和独特的文化风格。司马迁曾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sup>[4]</sup><sup>2304</sup>“权变”而“言纵横者”,不仅要机敏善辩,且需知识丰富,融会贯通,这是三晋文化中的一个特色。显然,在司马迁

收稿日期:2009-09-10

作者简介:邹绍荣(1980-)男,四川天全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物资出版社文史编辑。

李小树(1949-)女,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生活的时代 这种文化特色仍在延续着。

当然,儒学在三晋文化中并非全无影响,如东汉时期上党潞人冯奉世,“学《春秋》涉大义”,其子“野王、逡、立、参至大官”。“野王字君卿,受业博士,通《诗》。”“逡字子产,通《易》”,“立字圣卿,通《春秋》”,“参字叔平,学通《尚书》。”<sup>[5]3294</sup> 晋阳人刘茂,“孝行著于乡里。及长,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sup>[3]2671</sup> 等等。

在史学方面,晋建国伊始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晋大夫籍氏世掌晋之典册,晋太史董狐<sup>①</sup>即是立于君侧书言录事之人。晋国史官记录典章政令、重大历史事件及君臣对话与活动,最后形成春秋时期较为完善的官方史记《晋乘》,即《孟子·离娄下》中所说:“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sup>[6]2728</sup> 此外,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载:“《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sup>[7]17</sup> 显然,《晋春秋》是一部在《琐语》中提及的晋国史著。

金毓黻先生在述及先秦史官时,列出了见于史载的晋国及“分晋”后韩、赵、魏三国的史官共 13 人,其数量仅次于周王室<sup>[8]9-11</sup>。可见,当时三晋地区的官方史学,至少在制度设置上是有基本保证的。在晋国史官中,以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的董狐最为著名。

《左传》宣公二年(前 607)载:其年九月,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sup>[6]1866</sup> 这种“书法不隐”的精神不仅使董狐作为一名杰出史家而口碑卓然,备受推崇,同时也成为一种传统,被此后三晋地区的史官所承继,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由上可见,就史学传统而言,先秦时期,三晋地区的史学发展比较好,不仅有《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且有董狐等“国之良史”及由此而显现出的“书法不隐”的直笔书史的史学传统,成为我国史学发展中的宝贵财富。

两汉时期,三晋地区的史学发展相对平稳。西汉时,修《春秋左氏传》的张敞为河东平阳人(今山西临汾西南),元帝初曾任太原太守<sup>[9]1451</sup>。这种因经而治史的活动在两汉时期的三晋一直在延续,如“建安中,

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sup>[3]2584</sup> ;“魏郡人”许淑撰《春秋左氏传注》<sup>[9]2325</sup> 等。

## 二、公元 3-6 世纪三晋史学的发展

公元 3-6 世纪,先后有多个政权在三晋地区的晋阳建立国都或陪都,使以晋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圈得到进一步强化。

汉末曹魏时期,任职三晋的地方官员杜畿、牵招等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对这一地区文化的正常发展提供了保障<sup>[10]496,732</sup>。这种文化的正常发展,在西晋大一统的局面下得到更好的体现,学识深博者数量渐增。

这一时期三晋地区的文化发展,对居于其地的匈奴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文化上相对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十六国时期,这种基于“文化认同”而出现的“改善”在匈奴族上层统治集团中显现十分突出。建立十六国汉政权的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sup>[12]2645</sup> 刘渊不仅自身好学,且想法吸纳学者,深信厚倚,让其为己效力。

在这种背景下,在匈奴族上层刘氏集团中,好学俨然成为一种风气。刘渊之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sup>[12]2652</sup> 刘渊之子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sup>[12]2657</sup> 刘渊“族子”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sup>[12]2683</sup> 刘渊重臣匈奴人刘宣,“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sup>[12]2653</sup> 这成为十六国时期三晋文化在战乱环境下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南北朝时期,三晋地区的文化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北魏统治时期,从献文帝拓跋弘到宣武帝拓跋恪数十年间,对教育比较重视,文化发展的状况也比较好。虽然其间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和文化中心南移,但三晋地区的文化发展并未受到明显影响,北魏统治者的重教政策,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作为帝王的孝文帝本人,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重文”的倾向非常明显,这为王都之地的三晋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虽然孝文帝在即位十多年后才亲政,后又移都

①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卷 10《辨职篇》中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董狐位列首席。见(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82 页。

洛阳。但三晋作为北魏王都的长期所在地。其文化发展有着政治中心地带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同时统治者的重视,对民间的文化教育活动也起到了明显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北魏后期著名学者李业兴便是一个很好的事例:上党长子人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修,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深博。……学术精微,当时莫及。”<sup>[1]P725</sup>李业兴之子李崇祖同样博学多识<sup>[1]P725-2726</sup>。

像李业兴父子这样学识渊博的学者,只有在习学风气非常浓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在当时的三晋地区,李业兴并非“孤例”,如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裴敬宪,“少有志行,学博才清,抚训诸弟,专以诵读为业。”<sup>[12]P1870</sup>裴氏兄弟“专以诵读为业”,如果没有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很难想象的。

北魏时期,三晋地区相对较好的教育和文化状况,在北齐和北周时期基本被延续下来,在此时的三晋地区,无论潜心研习还是拜师求学,抑或授徒传业,都不是稀见的现象。

公元 3-6 世纪三晋地区上述相对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状况,在“大环境”上为史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种背景下,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较快,逐步摆脱了完全依赖《尚书》、《春秋》等儒经的传播模式,出现了以研究历史著作作为重要学业的史家。

在当时的三晋学者中,以史论事,撰述记史,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如太原晋阳人王昶,曹丕即位后外任刺史,曾“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於时务者二十余篇”<sup>[10]P744</sup>。依古制而论事务,是典型的以史论事的著作。晋武帝时期,中书监荀勖、侍中冯沈在“议齐王攸当之藩”中,王昶之子王浑在上书中以西周之史而谏当时之事<sup>[2]P203</sup>,同样是以史论事。

而史才突出者也不乏其人,如太原晋阳人王沉,“少孤,养于从叔司空(王)昶”,“好书,善属文”,“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勖、阮籍共撰《魏书》。”<sup>[2]P1143</sup>王沉后来叛曹氏而附司马,并以此封侯,被后世史家斥为“不忠于主”,由其主修的《魏书》也因此受到指责。但《魏书》作为曹魏国史,内容较为丰富,王沉作为此书的总其成者,史学才华突出,这是

不能否认的。此外如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18篇)的作者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裴秀<sup>[2]P1039</sup>,“世修儒史之学”、曾“撰《列女后传》”的河东猗氏人王接<sup>[2]P1434.1436</sup>,曾著《远游志》(10卷)、《异物志》(10卷)等的上党(今山西长治)人续咸<sup>[2]P2355</sup>,以及曾删前秦史“为《秦纪》十一篇”的河东裴景仁<sup>[7]P359</sup>等,皆为三晋地区有成就的史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三晋地区的学者和史家,有一些人的文化和史学活动被载入史书中,主要在其离开三晋之后。离开的原因,在曹魏和西晋时期,多因求仕或入朝任职,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则多因北部的战乱而南迁,因而,他们在学术和史学上的“后期影响”,主要不在三晋地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学者的学术素养的培育、学识的积累甚至其早期的学术活动,大都与三晋地区相关,是三晋地区的学术环境与史学传统造就了这些人才,他们赖以成名的学术才华和史学成就,都源自于三晋,同时也是三晋学术与史学状况的一种反映,这种状况在此后的北朝时期同样存在。

至北朝时期,随着战乱的减少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三晋地区的史学状况也明显好于魏晋时期,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而见于史载者,为数不少。应当指出的是,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向三晋地区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 5 世纪中后期包括史学在内的三晋文化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北魏太延五年(43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后,将大批河西士人迁于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这些士人入北魏后,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皆礼而用之”,<sup>[13]P3877</sup>其中不乏成就十分突出的学者。魏收在《魏书》中对赵逸、胡方回、胡叟、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阚骃、刘昞、赵柔、索敞、阴仲达等 12 位河西学者的评价是:“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故于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sup>[12]P1164</sup>这 12 位学者,除刘昞外<sup>①</sup>,皆被迁入平城。他们及其他学者入魏之后,对北魏以平城为中心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和学术风气的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司马光所说:平凉州之后,“魏之儒风始振。”<sup>[13]P3878</sup>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认为,河西学者入魏之后,“上续汉、魏、西

①刘昞因年老未行,但他博学多才,曾“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他的史学造诣颇深,有《略记》、《敦煌实录》、《凉书》等历史著作。刘昞虽未至平城,但北魏一朝对他推崇备至。且其助手索敞、弟子车骏皆来到平城,对北魏的史学建设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见《魏书》卷 52《刘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1160-1161 页。

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sup>[144]</sup>

河西学者的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他们不仅在北魏行政机构的设置、礼仪律令的制定以及文化教育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北魏史学的发展。

在入魏的河西学者及其子孙中,有不少担任过北魏著作郎、著作佐郎等职,负责国史的撰修。如程骏受崔浩赏识,就曾担任过著作佐郎和著作郎,其家族子弟程灵虬亦曾为著作佐郎和著作郎<sup>[12]1345.1350</sup>;阴仲达曾任秘书著作郎<sup>[12]1163</sup>;段承根也受崔浩推荐任著作郎<sup>[12]1158</sup>;赵柔曾任著作郎<sup>[12]1162</sup>;宗钦曾任著作郎<sup>[12]1155</sup>;李宝之孙李瑾曾任著作佐郎,李燮曾任著作佐郎<sup>[12]888.889</sup>;李琰之“兼著作郎”<sup>[12]1797</sup>;江式于正光中“兼著作佐郎”<sup>[12]1965</sup>等。在史著撰修方面,入魏的河西学者及其后代也不无贡献。

北魏以平城为都将近百年,河西学者大规模入魏后,平城作为首都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由此形成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在“非自然状态”下实现的,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色彩。但是,文化的碰撞及其迸发出新火花的力量,并不因交流形式的差异而变得孱弱。因而,此次河西学者的“群体性迁移”,对于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三、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的区域特征

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的状况总体上是比较好的,从区域发展来看,史学发展的家族性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特征。之所以出现这种特征,原因在于:

其一,宗法制的深远影响。河东地区由于具备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优越的地理环境,个体小农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宗法制的肥沃土壤。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法制,家族是这一制度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且宗法制与儒学的“孝”、“悌”等强化家族观念的道德规范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在公元3-6世纪的三晋人中,以孝悌闻名者并不少见,以裴氏家族为例,如裴衍,“事亲以孝闻。”<sup>[11]1651</sup>裴宣,“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称”裴脩,“二弟三妹,并在幼弱,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次弟务早丧,脩哀伤之,感于行路。爱育孤侄,同于己子,及将异居,奴婢田宅悉推与之,时人以此称焉。”<sup>[11]1374</sup>裴延俊,“少孤,事后母以孝闻。”<sup>[11]1377</sup>裴文举,“少丧父,其兄又在山东,唯与弟玠幼相训养,友爱甚笃。玠又早亡,文举抚视遗孤,逾玉己子,时人以此称之。”<sup>[11]1405</sup>裴宽,“亲歿,抚诸弟以笃友闻。”<sup>[11]1397</sup>

总之,这种具有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在三晋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

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宗法伦理观念和纲常礼教思想能够在三晋地区发展得比较典型,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三晋文化思想的基本倾向,从而为家族观念的强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这种较为强化的家族观念在史家的学术传承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家族性史学特征的形成。

其二,这一时期,三晋地区的儒家文化较为发达,而“家族本位”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在三晋地区,儒学是家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如河东裴氏家族便是儒学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其家族成员广泛阅读儒家经典,具有史学知识。如裴延俊“举秀才……除著作佐郎”<sup>[11]1377</sup>裴骏“通涉经史”<sup>[12]1020</sup>裴宪“修尚儒学”<sup>[2]1050</sup>裴植“少而好学,览综经史”<sup>[11]1648</sup>,裴仲规“少好经史”<sup>[11]1380</sup>裴镜人“涉猎经史”<sup>[11]1399</sup>,而太原晋阳人王昶、其子王浑、其族子则皆有史才,等等。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常常以家族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一方面,三晋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三晋在文化上以精英荟萃、贤才辈出而著称,而这些杰出的人才,许多是以家族形态出现的,这成为当时三晋文化传承的核心形式,史学也不例外。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较为著名的史学家族有:太原王氏,太原孙氏、河东裴氏、河东卫氏、平阳贾氏、平城李氏等。在三晋地区任著作郎或者佐著作郎以及撰写史著的人中,这些家族的学者占据了很大比例。

其三,对政治地位的家族性追求。三晋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后为晋国和韩、赵、魏三国的都城所在地,始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一批家族也因与权力的接近而拥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但自秦汉始,三晋地区长期与首都无缘且日益疏远,与权力中心的疏离极易让一些家族失去了原本拥有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而渐趋衰微。然而,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曾经强盛的家族都不会甘心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处境,他们需要通过有效的方式得到权力的认可甚至青睐,需要在权力集团中有家族成员作为自身的利益代表,以重新获得所渴望的地位与声誉。在经学盛行的两汉时期,当类似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的事情反复出现之时,当“博学”者备受统治者重视而更易入仕乃至飞黄腾达之际,对这种以“学优”而获仕的效仿,便十分自然地成为一种普

遍的社会现象,天下之士靡然向之。也就是说,在时人的观念中,在学业上变得优秀,是获取较高政治地位的“捷径”。这种观念在此后的公元 3-6 世纪显得更为突出。魏晋时,著名史家鱼豢所说“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王所嘉,下为国家名儒”<sup>[10]422</sup>,正是这种观念的表露。

显然,曹魏西晋之时,博学被认为是获得权力青睐、帝王嘉赏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这对长期远离政治中心,有着向政治权力靠拢的急切欲望的三晋地区的家族而言,无疑显得十分重要,勤学苦读由此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因而,到西晋时,原本并非儒学盛行之地的三晋,已经成为“特多儒者”的地区<sup>①</sup>。从司马迁所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到鱼豢的“至今河东特多儒者”,这种学风的变化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三晋地区的“家族性向学”,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因特定的生存环境而变得更加突出。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建号称王,成为“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之一。自此以后,面对“异族”的统治和前所未有的战乱,生活于三晋地区的家族,一部分为躲避战乱而举族南迁,一部分则因种种原因而留在了三晋。有的家族则部分南迁,部分留居,所谓“宗族分派,南北孤绝”<sup>[15]1772</sup>。留居三晋的家族,一方面不得不强化家族意识以自保。而在当时,任何家族都不敢把自身的安全与生存完全寄托于“异族”统治者的“护佑”之下,但个体的力量又过于单薄,无法抵御混战环境下可能发生的侵害,家族几乎成为人们“自保”的唯一依赖。因而,十六国北朝统治下的汉族士人,其家族观念高度强化,个人与家族处于一种毁荣与共的极为密切关系。一人显贵,可荫及九族,一人拜爵,则“亲族相贺”。反之,一人获罪,常覆族倾宗,不学无行,为家族之患。家族的安危与个体休戚相关,家族危而自身危,宗族安而自身安,家族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疏宗族而亲外姓,会受到严厉的指责,振宗福族会受到高度的赞扬,这种状况更普遍存在于长期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的三晋家族中。

另一方面,由于十六国北朝的大多数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对博学者常常比较重视,统治三晋地区的政权显得更加突出。“博通经籍,无所不览,

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的三晋人范隆便很受刘渊赏识而被任为大鸿胪<sup>[2]2352</sup>。这种“刘渊式”的重文,在统治三晋的政权中并不鲜见。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三晋地区的家族,希望族人通过研习并精通经史而获取政治上的较高地位,使宗安而族荣,仍然是一种重要追求。正如北朝著名史家魏收在《魏书·儒林传》的史论中所说:“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其惟学乎!信哉斯言也。”<sup>[12]1865</sup>

这句“古语”在《北史》和《隋书》儒林传的史论中被反复引用,这绝不是偶然的。《北史》和《隋书》的主修者或其父辈,都曾在北朝生活过,这是当时北方情况的反映。而在三晋地区,这种因学而贵,因学而显的状况并不罕见。勤学苦读受到族人的鼓励,博学者受到族人的推崇,宗族内的传学成为一种风气。作为一个宗族成员,如父亲去世,家族的其他成员要义不容辞地负起传学的责任。上面提到的三晋雁门人范隆,“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是族人范广“迎归教书”,才使范隆最终成为博学之人而受到重用,被刘渊任为大鸿胪、“封公”,死后被赠以太师,可谓誉隆而望重,宗族子弟也由此而显贵。这使宗族中的文化教育包括史学教育,在三晋地区受到普遍重视。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新兴(治今山西忻县)人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sup>[12]2289</sup>类似这样的家族性习史较多地出现在三晋,使这一地区史学的家族性特征较为突出地显现出来。

[责任编辑 乔林晓]

####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
- [2]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 [9]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10]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①《三国志》卷 16《杜畿传》裴注引鱼豢《魏略》说:“至今河东特多儒者。”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496 页。据张鹏一先生在《鱼豢传》中的考订,鱼豢卒于泰康以后,已入西晋,所谓至今,当含西晋在内。

[11]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54.

[15]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A Research on Sanjin's Regional Historiography in A.D. 300-600

ZHOU Shao-rong<sup>1</sup> LI Xiao-shu<sup>2</sup>

(1.China Logist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834;

2.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anjin was located in the connection reg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forming a plurality of geographical customs and cultures. As early as in the pre-Qin Dynasty, there had been "Jin Sheng", "Jin Spring and Autumn" and other history books, the tradition that was adherence to the "calligraphy is not hidden" and the good historian Dong Hu. In A.D. 300-600,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anjin's historiography were fast, using history on the matter, writing records of the history became the "academic tradition" displayed in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there were also a quite number of experts in historiography, official historians and authors of historic work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 group of renowned scholars of Hexi "mass migration" to the Sanji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anjin's culture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A.D. 5th century. In A.D. 3-6th century, Sanjin's regional historiography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a clear familial characteristic. Talented person of historiography were mostly from familial, and learning of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family members also became a more common phenomenon.

**Key words:** A.D. 300-600; Sanjin's historiography; development of region

会讯:

###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并召开

2009年8月8日至10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省历史学会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联合举办了“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著名院校、科研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31篇,参会论文既有理论方法的探讨,也有具体的实证研究。

早在2007年4月,行龙在《中国乡村研究》发表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述略》一文,率先将“集体化时代”上升到概念高度进行解释。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区域化,使得研究者更加依赖地方性知识建构起来的“语境”化叙事。伴随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微观化,进而提高了对支撑叙事的史料的要求。这也正是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应当首先从资料收集做起的原因所在。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呈现出如下3个方面的特点:

一、“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成为了多学科间形成跨学科交流的“同一”主题,所提交的论文既有对宏观制度和对策层面的把握又有个案实证的研究,既有对“新革命史”的关注又有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问题的探讨,学科间的畛域被打破,共同的研究对象成为实现学科互涉的实践基础。

二、从社会史角度加强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可以改变当前当代社会史研究薄弱的现状,这已成为广大与会学者的共识。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上看,“自下而上”的视角已开始成为学界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学术自觉。

三、通过理论本土化实践,实现对西方理论主导中国研究中种种“瓶颈”的打破,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新资料而迅速成长起来的社会史微观个案研究,以其植根于社会基层的学术价值取向,势必成为实现理论本土化的重要“策源”。

以“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作为中心议题,这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空前的。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试图对多学科领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标志着多元研究背景下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诞生。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尤其是集体化时代社会史研究中,本次会议都将具有示范意义。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张仲伟)